

# 后物欲时代能够来临吗?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郑也夫

我们遭遇这样一个时期,我说物质炫耀难以以为继,一个大的转变后呈现两种现象,一种现象,带着动物的种种欲望走来,可是物质极大地丰饶了。有些人开始胡吃海塞,结果导致种种的疾病。我坚持我的看法,人匹配消耗的资源有最佳——你有权,你住的卧室多大好?你住一个200平米的卧室,有什么感觉?你浑身都不自在。你看老虎,它的巢穴总是固定的尺寸,那个尺寸正好和它匹配,大的肯定不舒服。500米客厅,你马上感觉不自在;或者你硬撑着,你要显阔。像吃东西一样,一天吃几两肉,多少脂肪跟你最匹配?有一个最佳,大了肯定不行。物欲横流这种现象虽然存在,但是,另一种现象也悄悄地降临了,且成为一种趋势向前推进,就是非物质化的趋势。

后物欲时代来临,就是非物质的时代且成趋势,要分析后物质的趋势,需要微观研究,举几个例子:

一、恩格尔系数。就是全部消费当中,食品占的比重。从恩格尔系数看,毫无疑问从100年前到今天,如果以货币计算,食物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发达国家占比重比较低,发展中国家比较高,从中国看,这几十年来食品在全部消费中占的比重越来越低。

讲一下数字。1992年的时候,恩格尔系数就是食品占全部消费比重美国12,日本20,法国18,韩国30,墨西哥33,中国城市52,乡村57。你看到2000年美国9,日本、韩国、法国都是17点多,墨西哥26,中国城市39,农村49。2000年,中国城市39;2015年中国城市30.6,乡村39.3,30.39。1992年的时候53.58,但这完全不能证明,只是一个指标,一个方面的。再看穿衣服,1992年美国占全部消费的6.1,日本6.2,法国6.1,墨西哥7.1,中国城市14,中国乡村7。到了2015年中国穿衣服占的比重是7.6,乡村是6.1。

再看纸张消费,分两个,一个新闻纸,一个印刷的书写纸。新闻纸从生产到消费,从过去到现在,从100年前、50年前、改革开放三十年,一直呈上升趋势。毫无疑问现在生活用纸越来越多,2009年到了顶峰。但是2009年以后新闻纸使用下降了,这个最好理解。现在都用网络,谁还买报纸?体检周报最嚣张的时候能卖1000万份以上,现在衰落得一塌糊涂。还有书,2009年新闻纸开始下降,印刷从2012年开始下降。

从我们的物质消耗说,只有一种一直在上升,就是住房。城市1995年住房消费是全部消费的百分之七点多,2014年是22.5%;农村1995年是13.9%,到了2014年是21%。我认为货币GDP衡量永远是蹩脚的尺子,你不用它绝对不可以,不用的话,拿什么说事?但是用它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它里出外进,比如GDP,乡村劳务交换,你帮我盖个房子,我帮你收割麦子,不进GDP,实际的经济生活指标比GDP要高,但是有更多的黑洞根本没有创造GDP,比如桥,人家的桥能用300年,你的桥用30年就坏了,拆掉重盖,GDP是高了,但都是虚假的。两个商人走到一个小道上,有一泡狗屎,你吃了,我给你1000美元,这哥们吃了以后后悔,又拉一泡屎,让对方把它吃了;刚才丢了1000美元,也挺后悔,算怎么搞回1000美元,他把那个屎吃了。刚吃完,冒出一个经济学家,说“刚才二位合手创造了2000美元的GDP”。GDP有很多黑洞,在中国最大的GDP黑洞就是住房。



为什么住房业占的比重这么大,几百万一套住房,比硅谷都要高,这不是真正的物质的消耗,也不是工本的消耗,政府卖地皮卖了多少钱?这个话题不展开,点到为止。住房太高,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中国城镇化永远也不会完成,因为乡下人不能买房子住下来,所以有留守儿童,爷爷奶奶带着,还有下一代年轻人永远也没有梦。我们的学生敢说梦吗?他要娶媳妇买房子,都是房奴,哪有伟大的梦可做?没这个梦可做。中央党校一个教授摆了大量数据,告诉我们,政府地皮卖给开发商,大城市住房的钱,70%都是政府拿走了。

百分比越来越高的现象是文豪通讯,这些东西占的百分比越来越高。再讲另外一个数据来说明非物质化的趋势。畅销书作家凯文凯利三部曲,科技、技术需要什么,必然。凯文凯利虽然在史观上跟我有巨大差别,他认为历史是必然的,科学更加决定历史必然,但是凯文凯利在一点上跟我高度相似,有一个章节专门谈非物质化趋势。凯文凯利说,基本需求就是温饱,满足以后,医疗、通讯、娱乐、咨询业,法律咨询、财务咨询这些东西在六年前的一半,也就是说,2010年到2016年,美国出口一美元的东西,已经是六年前重量的一半。不仅如此,美国出口中40%是无形资产的出口,就是咨询业,非物质化的服务业,高端的服务业,文化服务等。

凯文凯利还提出,科技的非物质化的组织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随着科技的提高,原来做一件重要的物质,100年后用很小的量就把这件事做了,这不就是非物质化趋势是一种必然吗?

第三,历史上贵族文化的本质。凯恩斯说,猛然遭遇了温饱解决,跨过这个门槛后,你要休克了。他说的是,我们全人类,因为温饱就要解决了,北部已经解决了,南部即将解决,这个事情是史无前例。但是对人类的一部分人来说早就遇到了,这些人是贵族。因为阶级的问题,他们可以占有更多资源,早就解决了温饱,他们衣食无忧,早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代表人类率先遇到了这个问题:空虚、无聊,随之而来。怎么办?用诗化的语言说,生命之中不能承受之轻,也可以说是生活中不能承受之重。有生物学家说,世界上的所有动物、物种,都没有遭遇过丰饶。丰饶来了,高度不适应,这叫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但是换成心理

的反应就是心理不能承受之轻,原来要解决温饱都要有很大的付出,有很多劳作,有很多付出,有很多艰辛,现在都不需要,现在依靠伟大的机器,能很容易生产出来,价值观就变了,而时间怎么打发,原来时间主要投入创造了物质财富,满足生存,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这样情形产生了贵族分化,一部分人堕落,酒池肉林,或者叫荒淫无耻,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我们如果把道德化的字眼去掉,把它解释称中性词汇,就是你这么个体格,非要这么牛逼,就你非要消耗这么多资源,你一个男人非要一千个女人,这就叫荒淫无耻,这样一个数量是很可笑的。一部分贵族无可奈何地走入这样的泥沟,但是每个民族,还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伟大的贵族成员,他们指出一个出路,就是古典教育。你看古希腊、古罗马、中国,看孔子的时代。古典教育非常相似,诗书礼乐,弹琴、体育、射箭、骑马、修辞学。我的概括,古典教育跟今天教育的差别是什么,古典教育是教人生活,今天的教育是教人生产;古典教育不教贵族生产,生产那时候是贱民的事,我们有财富不要生产,但是我们不能荒淫无耻的生活,要干什么呢,就学习这些。

我把古典教育里面的宗旨用论语里的一段话来给大家说,大家马上就可能比我自己表达得更透彻。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问他,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富而好礼,孔子说可以吧。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就是富而不骄,不如富而好礼。子贡马上就接着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诗》论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就说,子贡,你长进了,我可以跟你一起讨论诗经了,你可以举一反三了。这段话里其实一个核心词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当子贡说诗经的时候,子贡是指谁,子贡不是说我是一个石匠,我是在打磨玉器,子贡指的是打磨自己。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个君子要跟老师走君子道路的人,要修行要打磨自己,要使自己在诗书礼乐各方面,朝着完美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复打磨自己,我还不够完美,差得远,我修养还不够,是指这个意思。当你温饱解决以后,你已经不能再吃更多的东西,你不需要更大的房子,可是你还有一种要

炫耀的东西怎么办,你只有向这儿炫耀诗做得好,你只有朝这儿进展,箭射得棒,马骑得好,这个进展是没有止境的,我可以一直往上攀升。

再用孔子的话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里这些话,可以帮助你理解贵族教育在做什么。当我向大家讲述的时候,其实我是分裂人格,我自己也时常跳出来,振振有辞,说得有道理。我为什么还是愿意和我观点相反的经济学家争论辩论,我觉得一路说过来,我的逻辑还是很硬、很硬,我觉得我的逻辑,这样一个炫耀的欲望是抹不掉的,但是当物质丰盈的时候,以前占有物质,消费物质,就是炫耀的利器,现在不好使了,难道不对吗?抹不掉就要替换,替换什么,古典贵族们最先遭遇了,不是走酒池肉林的道路,而是走艺术化的生活,把自己艺术化,让自己各方面的潜能,智力生活走向完美。往这儿走就可以化解物欲,这不是道德的提升,而是原来用物质找区别性,找不到了,这样的一种生存状态,生存环境的变化,伟大工商业倒逼出来的。这里道德和教育都会扮演一定角色,但不是本质的东西,本质的是生存变了,本能没变,必须换戏码找替代,这是我的逻辑,我希望大家从这个逻辑上找漏洞。

本逻辑是炫耀,炫耀的利器是物质,后来物质一下变得非常丰饶,拿物质炫耀不成了,工商业可以把任何一个产品,任何一个款式,很快输送给原来你炫耀的对象,可是本能抹不掉,只要找替代物,道德、教育可以扮演角色。但是现在社会现象跟我说的完全不是那回事,一个餐馆里的热闹,每个楼里隔三差五重新装修,但是置身这样的现象我觉得我的逻辑挺硬,现实中也不是没有惶惑,希望朋友们质疑。但是质疑别光摆现象,也别光说感觉,你不要说我是理想主义者,我不是理想主义者,我是现实主义者,但是我希望从逻辑上批驳我。

最后我谈一谈,为什么温饱解决了,还是物欲横流?简单是亘古至今的惯性,何况我们是长期穷困的民族,多少年不怎么做生产。除了以上原因,还有我们本能中没有自动节食的基因,为什么这么多人吃胖了,他不能自觉少吃吗?我们本能中没有这样的基因。那个基因在漫长的岁月里,对你是有好处的,贪吃对你是有好处的,因为你一直置身在食物匮乏的环境中,你及你的祖先是这样的,走兽飞禽大概都是,不是物质高度丰盈,物质、食物随手可以拿到,所以贪吃是品德,遇到肉赶紧多吃点,明天没有了。不是一时,漫长岁月里都是这样,所以贪吃是一个好的基因。可是没想到19世纪以后,食品极大丰富,到20世纪更大地丰富了,这下麻烦了,基因又没改,所以怎么办?这就必须靠后天的一点意志力来认识。环境变了,不能这么干了,我的本能的基因跟我对干,我还有理性,还有自控力,但毕竟你的行为在跟你的本能、基因对着干,本能、基因告诉你这东西好吃,还想吃一口,可是不能再吃了,你的内部是有一个纠结的,为什么物欲横流还是这样,因为本能还是那样。但倒逼的力量更大,因为你基因没有改,炫耀是你的本能,而炫耀不成怎么可能不换戏码。炫耀的基因是继承过来,吸引异性就要炫耀,摆几斤肉炫耀不了,我得换戏码,能把异性吸引过来,靠唱歌,写情诗,球打得好,我觉得这个力量更大。

# 《美国次贷危机及其货币政策——基于资本流动的分析》书评

■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沈悦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十年,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犹如昨天,令学术界和实践部门不断反思,总结经验。那么,为什么次贷危机恰恰发生在美国经济繁荣、资本大量流入的阶段?资本大量流入后美国的货币政策发生了何种变化?货币政策变化对美国资产价格,特别是房价的影响如何?与次贷危机之间在何种内在联系?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需要基于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学习,并能将资本流动、金融危机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梳理和实证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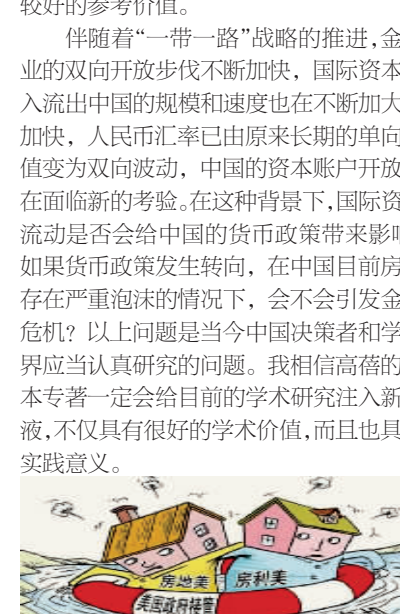
高蓓博士的专著——《美国次贷危机及其货币政策——基于资本流动的分析》是对以上问题的一个系统研究成果。在该书中,作者从资本流动视角出发,在综述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实证检验等手段,系统论证了美国货币政策与次贷危机之间的关系,资本流入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为什么国际资本要大量流入美国等问题,揭示了资本流动、金融流动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得出了一系列研究结论,其学术贡献和应用价值非常明显。总结来看,我认为该书的主要特色和贡献如下:

1、全面、系统地揭示了资本流入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次贷危机的发生是内生与不对称的经济体系,原因是美国货币体系的不对等导致大量资产通过购买政府债券流入美国,影响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并进一步影响联邦基金利率,而较低的联邦基金利率导致住房按揭利率偏低,住房购买意愿强烈,房地产市场供求矛盾突出,房价上涨并最终出现泡沫。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转向,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后,必然导致房价泡沫破灭,次贷危机发生。这对从新视角认识次贷危机的发生、发展、影响等都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2、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特别是房价的影响效应。作者利用资产价格的净现值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联邦基金利率对美国住房价格指数的影响明显,表现为当联邦基金利率较低时是房地产泡沫的积聚阶段,而联邦基金利率大幅提高后则是房地产泡沫的爆发阶段。同时,作者还论证了商业银行在其中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即商业银行在房价上涨阶段具有助长作用,而在房价下降阶段则具有助跌作用。这一结论为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资产价格泡沫,特别是房价泡沫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价值。

3、论证了资本流入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作者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由于国际资本持续流入,导致美国货币政策实际发生转向,这为次贷危机的发生埋下了祸根,最终必然爆发次贷危机。基于此,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入美国的原因及主要来源,发现是美元长期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必然结果,因此,根本原因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势在必行。事实上,次贷危机之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已经布局好,正在加速推进中。2016年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就是一个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国提供了新契机,对于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增强经济发展实力、扩大国际贸易规模、提高外汇储备水平、稳定人民币币值等,这些有利条件充分说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有其内在的理论推进逻辑和现实可行性。但是,在当今世界各主要货币处于竞争格局的时代,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不但会面临各种金融风险,而且在推进战略中稍有不慎,或者改革措施之间相互不匹配都有可能加大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甚或引发金融危机。作者在对该书对此问题也有提及,这对中国顺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金融业的双向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国际资本流入流出中国的规模和速度也在不断加大和加快,人民币汇率已由原来长期的单向升值变为双向波动,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正在面临新的考验。在这种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是否会给中国的货币政策带来影响?如果货币政策发生转向,在中国目前房价存在严重泡沫的情况下,会不会引发金融危机?以上问题是当今中国决策者和学术界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我相信高蓓的这本专著一定会给好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具有实践意义。



# 产权保护缺失,农地改革面临“空转”风险

■ 常红晓

中国决策者正在推动农地规模经营的改革,但产权保护的缺失,可能农地改革陷入“空转”的尴尬境地。近日发布的一份针对17个省份的农地产权抽样调查结果加剧了这种担心。中国决策者应把农地产权保护而非规模经营当作头等大事。

这项完成于2016年暑假的17省农地权利调查,中国拟2018年完成的农地确权进展十分缓慢,各省差异非常大;只有不到一半的村庄正在或已完成农地确权目标;只有9%的村庄给农户发放了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但绝大多数证书未记载农地出租、抵押等权属变更信息。

该调查涵盖了17个农业省份(包括黑龙江、吉林、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和陕西),覆盖中国农业总人口的34%。此次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土地政策与制度研究中心联合该校统计学院调查技术研究所开展,已是1999年来第7次调查。

调查显示,超过四成(40.5%)的受访村民称村庄并未就土地确权开过动员或宣传会,绝大多数受访者没有被告知发证的时间,证书颁发更是遥遥无期;半数受访者甚至没有被告知将要领证。在已颁发的证书中,普遍存在登记信息不全问题,30%左右的证书并非县乡政府盖章,属于无效证书。

中国正在推动“农地三权分置”,让经营大户或公司享有“农地经营权”,但是,产权缺失将

削弱农民对流转土地的掌控。目前,农地确权发证由中国农业部系统负责。从官方安排看,新一轮农地确权已“棋到中盘”,但此次调查揭示的基础不牢、信息缺失等问题,将挑战决策者推动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效率的目标。

中国决策者已要求把农户家庭承包的土地分为三种权利:集体所有权、农地承包权、农地经营权,并寄望于修改相关法律,让经营大户或公司获得农地经营权,并以此获得抵押贷款的权利。农业部官员称,三权分置更强调提高农业经营效率;更有学者认为,针对农地权利的过度保护,可能影响农业现代化进程。

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农地产权保护到底是不足还是过度了?从上述调查看,农民基于承包而获得的农地产权并未得到有效保护;农户对已被定义为用益物权的土地权利半信半疑,且缺乏处置权。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推动规模经营,将削弱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最终会恶化中国农户对土地的实质性控制。

这是近年来“改革空转”在农村政策领域的体现。三百多年来,中国决策者迫不及待地推出了近二百年“深化改革”的政策文件,但不少改革因缺乏地方支持和深思熟虑反而陷入困顿,流于形式。各地政府对中央层出不穷的政策疲于应付,只能“以文件落实文件”。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改革空转”。

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是个政治问题,也涉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按2003年施行的

《农地承包法》,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经营土地,仅限于农业用途,不能抵押和交易;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必须由政府征用,农民没有谈判权,只能获得最高相当于农业产值30倍的补偿。这造成了诸多群体性抗争事件。

中国农业部统计显示,目前,已有22个省份在全省范围推行农地确权。截至9月底,中国已有2545个县(市、区)、2.9万个乡镇、49.2万个村开展了确权试点,已完成实测面积近11.1亿亩、确权面积近7.5亿亩,分别约占全国二轮家庭承包合同面积的88%和59%，“摸清了承包地底数”。

但是,确权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首先是农户承包地的合同面积与实测面积存在较大误差。农业部按承包合同统计的耕地面积仅为13亿多亩,但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中国家庭承包的耕地面积超过18亿亩。这也是农地确权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如宁夏自治区承包地合同面积为1064万亩,此次确认面积1444万亩,比原记载面积多了36%。有的地方,实测面积要比合同面积多一倍左右。

其次,确权还面临乡村干部抵制或消极应对。农地确权,属于村集体的所有,乡村干部经常借土地调整获取利益;乡镇干部担心,土地确权会后,调整土地更难,征地中更难获取灰色利益。这导致很多地方的农地确权流于形式。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当前农地细碎化严重,在大规模土地整理前,农地确权成本很高,面临实际困难,甚至得不偿

失。

专家们担心,流于形式的确权可能让农地改革“悬空”。而在产权基础设施缺乏的情势下,推动农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可能赋予县乡政府更多的权力,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掌控更加弱化。同时,中国决策者还提出“集体所有权不能虚置”,土地学者认为,这在实践中不可操作,而农民对强化集体所有制也有余悸。

更有专家指出,“三权分置”核心是突出“农地经营权”,让农户大户或公司搞规模经营,可能让中国本已复杂的土地权利体系更为复杂,而让基于农户承包权的经营权抵押贷款,无异于“让租佃主抵押地主的土地”,实践中很难操作。不仅商业银行抵押贷款的意愿不足,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的风险也会加剧。

实际上,中国近年来推出的农地承包权抵押贷款、农村房屋抵押试点、集体建设用地抵押贷款试点,现实中进展非常缓慢,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这与改革主导思路的左右摇摆密切相关;种种约束下,基层政府更愿意以观望代替行动。

实践证明,在土地改革领域,中国决策者亟需的并非规模经营,更应该把政策重点放在产权保护和征地制度改革上;而农地“三权分置”的改革,也要稳妥试点,不能急于求成;至于修改《农地承包法》,赋予“农地经营权”以法律地位,存在巨大争议,未免过于冒进,从长计议可能才是必须的选择。